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向燕南

中国古代史学卷

①下

「史学史研究」文选

总主编◎杨共乐 本卷主编◎向燕南

中国古代史学卷

①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史研究》文选. 中国古代史学卷. 下 / 向燕南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080-9056-6

I. ①史… II. ①向… III. ①史学史—文集 ②史学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091-53 ②K09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720 号

《史学史研究》文选. 中国古代史学卷. 下

总 主 编 杨共乐
本卷主编 向燕南
责任编辑 杜晓宇 王 敏 董秀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
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43千字
定 价 75.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史学史研究》文选顾问委员会

顾 问

刘家 and 瞿林东 陈其泰

吴怀祺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向燕南 李 帆 杨共乐

张昭军 汪高鑫 张 越

周文玖 易 宁 董立河

序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的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

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为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本刊在历任主编、主要编辑人员和史学所、历史学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海外也有较高知名度的学术期刊。在国内,本刊通过刊发大量高质量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已经成为全国高校

和科研单位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发表学术观点的重要平台。同时，本刊重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本刊1999年第3期刊发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写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的贺信，祝贺其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总书记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重要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海外，本刊发行到美、俄、英、法、德、意、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而且对当地学者了解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本刊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国外代理中国出版的九千多种期刊中排名前五十位，被该公司评选为“2015年度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机构欢迎期刊”。

1992年，本刊在全国首次中文核心期刊测定中入选为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此后每评选皆得入选，现为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PCD）期刊源刊物、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 History and Life*）摘要与索引的来源期刊，并进入期刊方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认定的双效期刊。

在此刊物创办五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认真研读《史学史研究》全部刊文的基础上，分类辑录，精心出版《〈史学史研究〉文选》，内容包括《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上、下）、《中国近现代史学》、《外国史学》和《人物志》（上、下），共七卷，旨在展示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反映五十五年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历程。我们对我们的前辈和作者深怀敬意，我们对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我们将以更大的热忱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影响。

杨共乐

2016年9月25日

目 录

- 许凌云
1 刘知幾的史料学思想
- 陈光崇
15 杜佑的史学思想
- 史念海
20 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
- 岳纯之
41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始末考
- 朱仲玉
48 五代十国的史学
- 施 丁
58 司马光史论的特点
- 颜中其
72 《新唐书》修撰考
- 邱汉生
95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 张 元
106 评朱熹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 杨向奎
123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 刘复生
136 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
- 李 峰
147 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
- 李德铎
158 李贽《藏书》与唐顺之《左编》之关系考述
- 孙卫国
173 清官修《明史》与王世贞
- 罗炳良
183 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 杨艳秋
194 明中后期的史学思潮
- 卢钟锋
207 明代前期的朱学统治与学术史研究的朱学特色
- 叶建华
219 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 王记录
237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 251 仓修良
试论乾嘉史学
- 274 周少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史书编纂
- 291 汪受宽
实录史体起源于《敦煌实录》说
- 299 杨翼骧 叶振华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 332 汤勤福
《三朝北盟会编》引书数量及相关问题
- 349 张帆
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
- 356 刘浦江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 365 崔文印
《大金国志》初探
- 378 商传
《明会典》及其史料价值
- 391 方祖猷
清初搜集南明文献述略

- 姜胜利
398 清代明史史料学
- 张 升
412 卫所志初探
- 乔治忠
425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 王 尧 沈卫荣
439 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

刘知幾的史料学思想

许凌云

一、关于史料学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含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等。这些观点，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在近些年来，白寿彝先生反复阐明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见解，史学理论界研究也逐步深入，人们才普遍加深了理解。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家写的历史只能说是客观历史的记录，是客观历史过程在史家头脑里的反映。质言之，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客体，后者是客体通过认识历史的主体（历史家）的反映。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之间，亦即主体和客体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差距。我们的责任在于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使我们的认识逐步接近客观实际。

作为已经逝去了的客观历史过程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想了解人类的过去，只有凭借人类社会客观历史过程所遗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史料”。这个史料，既是我们认识已往客观历史真相的中介，又是已往史家对客观历史认识

的记录,即写的历史。这个“写的历史”,有时可理解为“史料”,有时可理解为“史学”。史料与史学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种看法,在今天都已成为常识,但是就是这些常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还没有弄清楚。

研究史料之成为“学”,它意味着是个系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其基本的理论、基本的内容、基本的方法。把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去看,它自然包括着史料学,史料学是历史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史学理论自然也包括着史料学理论,史学史自然也包括着史料学史,史学方法论也包括着史料学方法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我们把史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去研究,它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方法。

白寿彝先生在其《中国史学史》第一册里指出:

史料学,我认为,可以包含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实用的部分。理论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料跟史学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史料本身的特点,史料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历史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类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的各种分类的方法,目的在增进对各种史料性质的理解并因而便于收藏和检寻。应用部分,如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之类。近年所谓史料学,大致属于第四部分之内容为多。

我认为,白先生所设计的关于史料学建构的理论框架,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最为科学的理论表述,是对史料学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把史料学区分为理论的、历史的、分类的、应用的四个部分,即是说史料学的学科体系应包含史料学理论、史料学史、史料分类学和史料应用学,这不但反映了历史实际,而且打开了研究者的眼界。下面,我试图以白先生所提供的思路,具体探索刘知幾在史料学上的贡献,重点探讨他的史料学思想。

二、刘知幾的史料学理论

刘知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史料学家。他的史料学理论，在中国史料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具体阐明了史料学的任务。《史通》一书在许多地方讲到了史料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此处所言之“史”，可以理解为历史记载。他曾具体论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作用：“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作“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史通·史官建置》）这就是说，历史记载可以劝善惩恶。大而言之，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小而言之，可以使人接受历史的教育启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幾反复强调“史”的重要作用，这个“史”可以理解为史书，亦可以理解为史料，总之都是记录的历史，尤其是史官的记录。

然而，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因而刘知幾特别强调直书。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提倡直笔，反对曲笔，是刘知幾史学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是史料记载能否劝善惩恶的关键。他在《曲笔》篇又重申这个道理：“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刘知幾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是史家的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满腔热情高度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的直书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

容”的高风亮节。主张史家“据事直书”，用刘知幾的话说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强调史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这一思想是对古人的继承。一是在书善恶时，不要加上主观成见，“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而要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这一思想是知幾的发展。知丑、知善是史家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时至今日仍有教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其特别重要者乃是史家的识、德。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观念是其一，要求史家有卓识；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这就要求史家有德。无论是历史是非，还是现实是非，标准如一，态度如一，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上自圣人，下至匹夫，都以事实之善恶是非断案，进而以极大的勇气劝善惩恶。《史通》一书处处体现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幾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幾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对史家的严峻考验。

其次，刘知幾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他在《史官建置》一文中指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在这里，“当时之简”，指史官所记，当指史料；“后来之笔”是史家根据当时之简而勒成删定，当指史学。而史料，要求“博闻实录”；史学，则要求史家具备“俊识通才”。两者要求自不相同。然而两者又有相须相成的关系，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学，史料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刘知幾在叙述魏晋以来史官职责时指出：晋元康初，设著作郎一人，又置佐著作郎八人，专掌史任。“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史官建置》）这里，“博采”系指搜集、记录史料，正郎在此基础上草传史书。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把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就是著作之书；所谓“记注”，则是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亦即史料，其作用是“备稽检而供采择”，是对原始材料的记录、整理、选辑和汇编。而撰述应该有观点、有分析、有创见。这同刘知幾的说法大体上是相一致的。由是观之，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可以区分为史料和史

学两大类，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如二十四史，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学，今天看来，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了。这是另一种情况。还有，即使在封建时代称得上是史学的历史作品，也大都为后人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史料。由此看来，对史科与史学的理解应该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鉴于“史学”的含义因人而异，我们的认识不必绝对化。刘、章的基本看法已经明确了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而在二者发挥社会作用时，也很难说谁更有社会价值。在《史通·辩职》中，刘知幾论述史学家职责，析为三等：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缺，复何为者哉！

在这里，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上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刘知幾论史学社会作用的根本见解。而“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亦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如以“史才三长”论之，其中，“编次勒成”，强调的是“史才”，如左丘明、司马迁；“高才博学”，强调的是“史学”，如史佚、倚相；而“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强调的是“史识”。如以史料、史学论之，董、南从事的则是史官执简、据事直书的史料工作，后两者倒是趋近于史学。南史、董狐，据事直书，敢于彰善贬恶，这是史家有卓越史识的表现。刘知幾给予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他并不看轻史料工作，而且相当重视史料记载，以为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他认为，“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即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就会“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这说明，史料记载是史书流传的客观条件，无史料则无史籍，更无史学。而史籍叙事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往往取决于史料的多寡。他认为往古史册所以简略，近世史籍所以详审，盖由于史料记载的多寡不同。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

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史通·烦省》）至于西汉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乃因汉天下一统，收集史料方便。“降及东京，作者弥众，……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总之，从史料采集而言，远略近详，这是客观情势使然。史料多，史书自然亦多。

再次，刘知幾阐明了史料跟史学的其他部分的关系。这里主要指它同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的关系。这些见解体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中。史才也包括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史识则包括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

最后，刘知幾还阐明了史料学自身的一些理论问题。

比如，史料求真的宗旨。许冠三先生《刘知幾的实录史学》绪言中说：“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这是把握刘知幾史学真谛的正确结论。书事记言，务必存真求是，当是刘知幾史料学的根本宗旨。所谓存真求是，就是史官执简，善恶必书。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嫫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史通·惑经》）要求史官书事记言严格坚持善恶必书的原则，就像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官必须排除一己之爱憎，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完全如实地记载，既不要“美者因其美而美之”，也不要“恶者因其恶而恶之”。务求“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做到“不掩恶，不虚美”。应该说，要求史官排除一己之爱憎，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录史料，这是非常光辉的史学主张，离开史料的真实性，有关史学的一切主张都无从谈起。如所周知，“善恶必书”是我国古代史官书事记言的优良传统，这也许是我国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而且发挥劝善惩恶重大社会效益的原因所在。

然而要做到实录直书是很不容易的，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必须反对隐讳虚美，曲笔诬书。他批评孔夫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